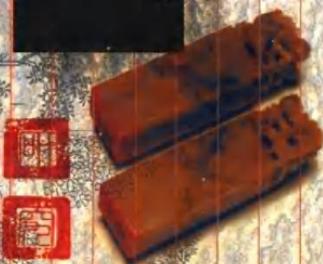


# 村语

欧阳觉亚 著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孙宏开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 村语研究

欧阳觉亚 著

1986年6月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村语研究

欧阳觉亚 著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印张	8.25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插页	4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千字	221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
开本	850×1168 1/32	印数	1—500

ISBN 7-80613-586-3 / H·99

定价：50.00 元

# 序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此从 50 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现了不少新的语言。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成果，曾作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于 1980～1987 年正式出版。

8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促进了民族语文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也为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机遇。在此期间，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深入边疆、山区、海岛，又陆续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往往不为人们注意，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尤其是一些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急需抓紧时间调查，以保存这些珍贵的语言资料。为此，我们从 1992 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机构的支持下，对这些语言逐个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经取得了

一批研究成果，并决定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

我们认为，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编辑出版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远东出版社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 审 委 员 会

1996 年 1 月

# 目 录

<b>第一章 绪论 .....</b>	<b>1</b>
第一节 村人的来历和生活习俗 .....	1
第二节 村语的使用情况 .....	10
第三节 村语的概貌及其地位 .....	12
<b>第二章 语音 .....</b>	<b>16</b>
第一节 村语语音系统 .....	16
第二节 声母韵母配合关系 .....	26
第三节 村语的汉词读音 .....	39
第四节 村语的汉字读音系统 .....	52
第五节 村语的汉词和汉字两种读音的比较 .....	70
<b>第三章 词汇 .....</b>	<b>81</b>
第一节 词汇的构成及其特点 .....	81
第二节 不同来源词汇的统计 .....	90
第三节 构词方式 .....	92
<b>第四章 语法 .....</b>	<b>98</b>
第一节 词类 .....	98
第二节 词组 .....	135
第三节 句子 .....	141
<b>第五章 村语的系属问题 .....</b>	<b>153</b>
第一节 村语与壮侗语族诸语言词汇异同的比较 .....	153

第二节 村语与黎语的比较 ..... 155

## 附录

一、常用词表	192
二、故事一则	229
三、歌谣	234
四、村语汉字读音材料	235
五、村语、军话、儋州话、普通话字音比较	244
参考书目	253
后记	254

# 第一章 絮 论

## 第一节 村人的来历和生活习俗

海南岛东方和昌江两个黎族自治县有 8 万余自称“村人”的居民,其民族成分一向被认为是汉族,他们也自认为汉族,但却使用着一种不同于汉语的语言。用他们的话来称自己,他们是  $\eta a:u^1 fən^1$ ,即“村人”的意思。附近的黎族称他们为“美”(moi),即汉族。但当地一般人除了称他们为“村人”之外,还称他们为“哥龙”,即大哥的意思。人们之所以称他们为“哥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老大来尊称,而是因为村人称祖辈、父辈多以兄弟排行相称,凡排行第一的都可以称“龙”( $loŋ^2$ ),如  $loŋ^2 zɔ^1$ “大祖父”, $kɔ^2 loŋ^2$ “大哥”、“表兄”, $loŋ^2 nɔ^2$ “外祖父”(排行最大的)。儿子称父亲也可以叫  $loŋ^2$ ,甚至儿媳也可以随夫称公公为  $loŋ^2$ 。村人使用“龙”字十分频繁,因此,人们仅仅把“哥龙”作为一个绰号来称呼村人。村人称自己所操的话为  $tshən^1 fən^1$ ,直译是“村话”。操村语的人居住成片,分布在海南岛西部昌化江下游南北两岸,包括南部的东方黎族自治县四更镇、新街镇和三家乡,北部的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城乡昌化镇以及保平乡的部分地区。大约 75% 的人分布在昌化江的南岸,大约 25% 的人分布在北岸。

东方县的人口有 265100 余人(1982 年),汉族人口 209300 余人。村人人口没有精确的数字,一般估计当时有 45000 人,约占全县人口的 17%,占全县汉族的 21.5%。村人比较重视教育,学生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因此,在县里各个部门当干部、职工的较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县外、省外工作的人不少,

有相当多的人在省内或省外是某一部门的主要领导，具有高级职称的人也不少。

这里的村人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迁来的？过去没有记录，无从查考。他们之中，有人说是从福建来的，有人说是从江西来的，但都缺少足够的证据。因此，人们对他们的汉族成分和来源一直弄不清楚。如果是汉族，怎么会放弃汉语而采用这种村语？岛内有操不同汉语方言的汉族，如“军人”、客家人、海南闽语人、粤语系统的迈话人、儋州话人等，他们来海南岛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但都完好地保存着自己原有的汉语方言，就是只有 1000 多人的富马村（东方县四更镇）也保留他们原来独特的汉语方言。为什么偏偏讲村语的这部分汉人没有保留自己的语言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能否把他们假定原为黎族，由于受到汉族的同化而变为汉族？这个假设恐怕不能成立，因为如果他们原为黎族，受到汉族的影响，首先改变的应是他们的语言，即放弃黎语而采用汉语。正像海南岛黎族聚居区东部边沿地区那样，那里的黎族人除了老年人还听得懂黎语以外，中年以下的都不懂黎语了，但他们的黎族意识仍十分强烈。而东方、昌江这里的村人却相反，先改变了民族成分，包括民族自我意识以及一些其他习俗，而其语言却保留下来了。这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如果是受汉族的影响，那些影响他们的汉族住在什么地方？是操什么汉语方言的人？谁也无法回答。因此，我们推测，村人祖辈的主要部分不是当地的土著民族，而是外来的汉族，但杂有当地土著民族的成分。

我们不妨从村人居住的地理环境、历史、习俗、文化与心理状态、语言等方面综合观察，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线索。

从地理环境上看，村人居住的地方是昌化江下游的出海处，这个地方面对北部湾，与广西南部及雷州半岛的西部最近，与越南北部也是隔海相望。从这三个地方只要乘上小木船或渔船是很容易抵达今天的村人住处的。因此，村人祖先从这些地方迁来的可能性最大。

从历史上看,中古以来,北方战乱频繁,汉族人口几次南迁,移居海南的也不在少数。此外,历代封建王朝派兵至海南或广西镇压当地各民族的起义也有好几次。清朝以后的且不说,明弘治十四年(1501)黎族符南蛇在海南岛西北部地区起义,明王朝派兵镇压,战乱平息后军士多留下屯田,现今海南东方县、昌江县、儋县、三亚市等地的“军人”就是当年留下来的军士后裔,他们至今仍保留其原来的汉语方言——军话(属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与川、黔、滇和桂北的官话十分近似。海南岛上的苗族也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苗兵的后裔,也保留其原来的语言——瑶族的勉语。村人原来的语言早已消亡,可以断定,村人来海南的时间远比现今海南岛上的“军人”或苗人要早。

东方县四更镇的富马村,现有一两千名汉人,使用着一种与当地军话迥然不同的汉语方言,据我们在 80 年代的调查,这种富马话是一种起了变化的赣客方言。自然,富马村这些汉人的祖辈是来自大陆江西或其附近操赣客方言的地方。据富马村文姓人提供的有关情况,这里的文姓人祖辈是当年文天祥的部属,宋末抗元失败(1278)后,部众逃至海南,至今已历 27 代了。如果这一历史属实,富马村的汉人来海南岛定居已有 700 多年。这批汉人比村人少,移居海南后语言仍基本上保留原貌。可想而知,早已失去自己语言的村人应该比富马人来海南的时间更早许多年。

“军人”、富马人、海南苗族由大陆移居海南岛都是与战争有直接的关系。村人的先民由大陆移居海南岛很可能也是与历史上的战争有关。因此,我们不妨假设,比十二三世纪更早的中古某个时期,中国南方(两广地区)发生的某一次战争,一支汉族军队因战斗失利,部分军士乘船逃到海上,最后漂到海南岛西海岸,后来就在当地定居下来。这支部队的人数不会太多,如果人数众多,史书上会有记载;但也不会太少,人数太少,经过上千年的变化,会被当地土著同化得无影无踪。

翻开广西的历史,中古时代发生过两次重大的战争,一次是依

智高的起兵反宋。宋皇祐元年(1049)侬智高以安德州(今广西靖西)为根据地建立南天国。之后,派兵攻下右江的横山(今田东平马)。四年沿郁江东下,攻占横、贵、浔、藤、梧等州,并直攻到广州城下。后因久攻广州不克而折回邕州,最后兵败逃往云南。<sup>①</sup>

另一次战争是在唐贞元十年(794),西原州(今广西左、右江之间的大新县一带)黄峒人民在黄少卿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曾攻占钦、横、浔、贵四州。后因唐朝调兵镇压,受到挫折。到唐宪宗时,黄少度、黄昌瓘又攻占了宾、峦二州。元和十一年(816),再攻占了钦、横二州。长庆三年(823)黄少度部又进攻邕州,破左江镇,下钦州,破千金镇,占领了今广西南部和广东西南部的一十八州。直至懿宗即位时(859)才最后平息,战争前后经历了大半个世纪。<sup>②</sup>

从两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来分析,侬智高的起兵,多在右江、邕江、西江一带活动,兵败后又向西逃遁,战事没有向广西南部发展。唐代黄氏的多次起兵,战争基本上是在广西东南部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战争持续的时间长,波及的范围广,尤其是在钦州一带,双方反复拉锯,很可能在某一次战役中,唐军的一部兵败入海,最后抵达海南岛,就在当地定居下来。村人先民的经历是否与这段历史有关,目前还不能绝对肯定,但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村人的祖先真的是在九世纪初因战争而迁来海南的军士,经过1000多年的时间,发展到现在有八九万人。假定每100年人口平均增长一倍,那末当初村人来海南岛的只有100人左右,甚至不足100人。由于当时人口少,军旅中又多为男性,他们必然与当地的土著女子通婚,经过若干代之后,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语言,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们的原有语言只保留一些词汇,作为底层成分,残存在现今的村语里。尽管村人失去了原来的汉语,但在许多方

① 见《宋史》卷495《蛮夷三·广源州蛮》,中华书局,1977年,14214页。

② 见《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下·西原蛮》,中华书局,1975年,6329页。

面，他们仍保留其汉族的特征，他们汉民族的意识仍然较强，因而始终没有完全被同化于当地土著之中。

从习俗上看，村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与附近其他的汉人基本上相同，与黎族也有些类似。村人的服饰，现在已全部为汉装，据当地老人说，过去妇女上衣袖较宽，开右襟，下穿褶裙，而黎族妇女穿的是无领上衣，对襟，袖子都很窄，下穿筒裙。村人男子全部穿汉装，妇女结髻在后；黎族妇女喜戴大耳环，颈戴项圈。村人妇女只戴小耳环，不戴项圈，孩子有的在脚上戴镯子。

在饮食方面，村人常吃鱼，做法与汉人相同，而黎族除了有与汉人一般的做法之外，还有一种最具特点的腌酸鱼。村人喝酒，但没有黎族那种“山栏”米酒，也没有黎族那种用管子吸饮的方式。

在居住方面，村人住的全部为砖瓦房，中央为正厅，厅后放祖宗灵牌，两侧为卧室，子女与父母同住，而黎族过去全部为船形茅草屋，房内没有间隔，成年子女要与父母分居，粮仓建在住房之外。村人有用于粮食加工的石臼和木杵，这与黎族近似，但臼的形状不相同。

村人的婚丧习俗多与汉人相同。青年男女有在一起唱歌的习惯，但都重视贞操。婚后一般不容易离婚，如发生离婚，孩子全归男方。黎族青年男女婚前有性自由，父母不加干涉。离婚较自由，非婚生子不受歧视。

在丧葬方面，村人死者入殓要停棺若干天，坟墓用砖砌成房屋形状，每年要扫墓。有拾骨二次葬的习惯。黎族中心地区人死即掩埋，并习惯毁弃死者遗物。坟地不留标志，也不扫墓。村人还有宗祠。

在节日方面，村人节日有春节、正月十五（小年）、二月初二、三月清明、五月端午节、七月十四、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九重阳节、十一月冬至、十二月除夕。黎族一般只过三月三这个节日。

在禁忌方面，村人晚辈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特别是已死之

人。一旦呼叫已死人的名字，就等于咒骂死人的亲属。孩子一般不敢直呼父母的名字，这些都和黎族相同。

在迷信习俗方面，村人没有杀牛祭鬼给人治病的习惯，但小病也有杀鸡（或用鸡蛋代替）祭鬼的做法。黎族过去有小病杀鸡，大病杀猪，重病杀牛祭鬼的习惯。黎族有禁公禁母、放蛊害人的传说，村人没有这些陋俗。

在文化娱乐方面，村人酷爱唱歌，男女都喜欢在谈恋爱时唱歌，这方面与黎族十分相似。但歌词押韵方法上与黎族的押腰脚韵不同。

在口头文学方面，村人除了即兴唱歌之外，传说故事较少，而黎族传说故事非常丰富。

由于村人与黎族的习俗不同，黎语的一些反映独特风俗习惯的词，如“项圈”、“口弦”、“寮房”、“文身”、“遮羞布”等等，在村语里没有相应的说法。

在亲属称谓方面，村人有其独特之处，与其他地区的汉族不同，与黎族也不同。黎族称伯父之子女为兄、姐，称叔父之子女为弟、妹，不论其年龄大小如何；村人则以其年龄之大小来区分，长于己者为兄、姐，幼于己者为弟、妹，这与各地汉族相同。黎语的“外甥”与“孙子”同一个词，村语这两个词不相同。黎族过去有自己的单音名字，后来多采用汉姓名，村人的名字一律采用汉姓名，而且男子都按辈分取名。

从语言方面来观察，村语是一种近似黎语的非汉语，有不到一半的词与黎语相同，但有更多的词是村语独有的。其中有一些来源于汉语某一方言，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很不容易认出它的本来面目，这些是沉积在村语里的汉语成分。通过对这些汉语成分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村人的来历，至少可以推断出村人曾经与操哪一种汉语方言的人发生过接触。

第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将要讨论村语里的两种汉词（字）读音。一种是成套的汉字读音系统，利用这个读音系统可以朗读汉

文书报、诗词，也可以用来编唱山歌。在大革命时代，村人的分布地也是革命根据地之一，村人用这套读音来编唱山歌，宣传动员群众，也用这套读音开办学堂，让村人子弟受到启蒙教育。直到目前，人们仍可以用这套读音来读书报，并吸收新的汉语词汇。这套读音来源于近代或近古的北方汉语，明显的例子是有四个舒声，一个入声，有促声韵尾。在村语的影响下，有些音“村语化”了。

另一种是村语里的汉词，这种汉词分散在村语词汇的各个方面。其语音已“村语化”了，与村语的原有词读音相同，人们一般不会感觉它们是汉词。这种汉词的读音主要有如下的特点。

声母方面：

1. 中古帮组字与非组字已分化。

2. 中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声母全部读作不送气的清声母，即并、定、群、从、澄、崇等声母读作 ?b, ?d, k, tθ, ts, ts( ?b, ?d 是村语化的声母，以下记作 b, d) 例如：平 biəŋ<sup>1</sup>, 步 buə<sup>3</sup>, 糖 dəŋ<sup>1</sup>, 独 duək<sup>3</sup>, 棋 kei<sup>1</sup>, 桥 kiu<sup>3</sup>, 钱 tθin<sup>1</sup>, 罪 tθui<sup>3</sup>, 茶 tsa<sup>1</sup>, 沉 tsom<sup>1</sup>, 床 tsəŋ<sup>1</sup>。

3. 日母字有部分读作舌面鼻音。

4. 中古浊擦音已变为清擦音。

韵母方面：

1. 遇合三读 uə(数 suə<sup>3</sup>, 扶 fuə<sup>3</sup>) 和 ɔi(鱼 ɿɔi<sup>1</sup>, 句 kɔi<sup>3</sup>, 书 sɔi<sup>1</sup>)。

2. 止合三部分字读 ɔi(槌 tsɔi<sup>1</sup>, 匹 bɔi<sup>1</sup>)。

3. 流开三大部分读 ɔi(油 zoi<sup>1</sup>, 求 ko<sup>1</sup>, 抽 tsho<sup>5</sup>, 九 ko<sup>3</sup>)。

4. 咸摄深摄保留双唇音，如三 tθəm<sup>5</sup>, 合 kəp<sup>3</sup>, 镰 lim<sup>1</sup>, 接 tθip<sup>3</sup>, 犯 fam<sup>3</sup>, 金 khem<sup>1</sup>, 十 sep<sup>2</sup>。

5. 山开一主要读 ɔ-, 如散 tθən<sup>3</sup>, 懒 lən<sup>5</sup>, 擦 tθət<sup>3</sup>。

6. 山合一、臻合一读 uə-, 如算 tθuən<sup>3</sup>, 乱 luən<sup>3</sup>, 脱 thuət<sup>3</sup>, 本 buən<sup>3</sup>, 寸 tθuən<sup>3</sup>, 门 muən<sup>1</sup>。

7. 容开三读 iə-或 uə-, 如响 viəŋ<sup>3</sup>, 墙 siəŋ<sup>1</sup>, 样 zuəŋ<sup>3</sup>, 匚 tθuəŋ<sup>2</sup>。

8. 梗开三、四主要读 iə-, 如平 biəŋ<sup>1</sup>, 命 miəŋ<sup>3</sup>, 尺 tshiək<sup>3</sup>, 瓶 biəŋ<sup>1</sup>, 醒 tθiəŋ<sup>3</sup>, 锡 thiək<sup>3</sup>。

## 声调方面：

1. 舒声只出现 21,35,53 三个声调；平声分阴阳，(21,35)，上去不分阴阳，而且合并成一个调(53)。

2. 入声不分阴阳，主要出现 53,33 两个调，个别字读其他调。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村语的汉词读音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古汉语并、定、群、从、澄、崇等浊塞、浊塞擦声母读作不送气的清音（帮母读 b，端母读 d 是海南各种汉语方言的共同特点，因此，带喉塞的 ?b,?d 可以看作清塞音一类）。这个特点在全国各大方言里是少见的。吴方言和老派湘方言古并、定母今读作不送气的浊塞音，而村语已变为不送气的清塞音，与新派湘方言近似。在韵母方面，村语保留-m,-n,-ŋ 和-p,-t,-k 韵尾。入声阴阳相混，但又分读作两个调值。

此外，村语里有为数不多的粤方言词，这说明村人来海南之前曾经与操粤方言的人接触过。这些相同词是：木板鞋 khək<sup>5</sup>，鱼罩 təm<sup>3</sup>，八哥 liu<sup>1</sup>kɔ<sup>2</sup>，想 kək<sup>2</sup>（粤北有些地方“想”叫 kok），背（孩子） məi<sup>2</sup>，涮 lɔŋ<sup>3</sup>，捂 om<sup>3</sup>，戳 duək<sup>2</sup>，套 tha:p<sup>3</sup>，宰杀 thəŋ<sup>5</sup>，闷 kok<sup>2</sup>，傻 ŋɔŋ<sup>4</sup> 等等。

村语里还有很少几个属于海南话的和客家话的词，很明显，这些词是村人来到海南以后从海南话或客家话那里吸收的。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初步的结论：

1. 村人居住的地方是在海南岛西海岸及其附近，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是从昌化江口进入岛内的。

2. 从地理上看，村人很可能是从北部湾渡海而来，而从广西南部来的可能性最大。在路经广西时，曾与操粤方言的人接触过。

3. 海南岛的黎族，无论哪一个方言的人都有自称，而村人除了自称汉族或村人之外没有其他自称。村人的民族成分不是黎族而是汉族。由于通婚的结果，掺进了当地土著的血统。

4. 村人来海南岛的时间是在唐宋之间或更早，很可能是在唐代。从村语里的汉词语音来看，它似乎反映了唐宋以后的读音，如

帮组与非组已分化，浊塞音已消失，等等。这些特点与村人从唐代由大陆南来这一假设在时间上不怎么吻合。是否可以这样解释：当村人于九世纪从广西方面来海南岛时，其语言自然带有中古汉语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语言也渐渐发生变化，尽管他们与大陆本土人失去了联系，在新的环境里其语言基本上仍按着原来的轨迹或内部规律发展变化，正如汉语的其他方言那样。在新居地语言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变得既保持原有的样子和发展趋向，同时又逐渐产生变异，有别于原来的方言土语。也就是说，今天存在于村语里的汉词，其语音已不是当年村人初来海南时的面貌，而是已经起了一定变化的新的形式了。

5. 村人主要是成批地迁来，最初其成员主要是男性，人数不会太多。当然，后来也可能有零星的人参加到村人社会里来。

6. 村人的生活习俗与黎族有若干相同或相似，但主要的是汉族特点，准确地说，其风俗习惯多与南方汉族相同。

7. 村人与黎族没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他们彼此没有认同感，现在也不通婚，这也表明他们彼此不是一个民族。

8. 在语言方面，村人从使用汉语到转用一种与黎语非常接近的语言，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由于与当地土著融合，其结果是他们逐渐放弃原来的语言，只在现今的语言中保留若干汉语的成分。

9. 从语言的各方面观察，村语中的汉语成分是属于中古时代的一种汉语南方方言，与湘方言以及广西北部一些地方话很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因此，大概可以断定村人是在中古时期从北部湾进入海南岛的，他们的原居地可能是在湖南广西一带。不过，现今存在村语里的汉词其语音又与现在的湘桂一带的汉语有较大的差别，很难认为他们就是同一个方言，但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方言。因此，我们暂时认为村人的先辈所操的语言与湘桂汉语方言比较近似。

至于原来在海南岛与村人混合的人属于什么人，其民族成分是什么，目前只能肯定，这些人是海南岛的土著之一，可能是古时

一个与黎族很接近的部落。我们说这些海南岛土著与黎族不同主要是基于语言事实,因为在村语里有相当一部分基本词既与汉语不同,也与黎语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词目前还找不到来源(详见第三章第一节)。但总的看来,这个土著语言与黎语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 第二节 村语的使用情况

村人居住成片,在当地形成一个不小的聚居区。在这个社区之内以通行村语为主,无论在家庭内还是村内,人们日常生活均以村语作为交际工具。遇有外来人到村时,才根据不同对象使用不同的汉语方言。一般地说,与操海南话的人来往,使用海南话;与操军话的人来往,使用普通话或村人汉话(即村语汉字读书音,详后);与省外的人来往多使用普通话。

村内的小学使用普通话教学,课下师生多用村语交际。在乡镇机关或县级机关,一般多用海南话或普通话,但与自己人交际不管在什么场合都经常使用村语。

村人唱歌一般用村语,但也有用汉字读书音。民歌、情歌多用村语,宣传歌除了用村语之外,有时也用汉字读书音。

干部开讨论用村语,学习文件用汉字读音来念,讨论时则用村语。他们不仅可以用汉字读音来读文件,而且还可以用来朗读古文、诗词等。这套读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能听得懂。

在 50 年代以前,海南岛西部不通行海南话,本地区的“军人”较多,因此在公开场合多使用军话,甚至这里的黎语也通过军话来吸收汉语借词。村人在这个语言环境里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军话,他们一般都能听懂军话,但由于村语里的汉字读音(即村人汉话)与军话非常近似,双方用各自的话即可互相通话,所以他们一般不必学习军话,实际上也没有几个人会说地道的军话。建国后,由于全国教育系统大力推广普通话,上过学的年轻人几乎都掌握普通